



第七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6(c)

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外债可持续性与发展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报告。

* A/77/15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编写的关于外债可持续性与发展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根据大会第 76/193 号决议编写，在过去二十年趋势的大背景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 2021 年和 2022 年上半年外债可持续性相关核心指标的演变情况。还强调了各国家组之间和内部的重大差异。由于多层面的危机——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乌克兰武装冲突和气候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脆弱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外债可持续性方面的压力。本报告讨论了关于预防和解决债务的举措，旨在防止发展中世界发生普遍债务危机。

一. 引言：全球宏观经济环境

1. 发展中国家在外债可持续性方面一直面临着长期的和越来越大的压力。¹ 由于目前的多层面危机——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乌克兰武装冲突和与气候相关的冲击，这一本已困难的情况现在正达到危急的程度。武装冲突正在对这些国家产生级联效应。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努力履行其对外义务。² 先进经济体持续持续抽紧银根加剧了未来的挑战。虽然预计这些经济体将在 2022 年或 2023 年恢复疫情前的趋势产出路径，但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产出将在整个预测期内(直至 2024 年)保持低于疫情前的趋势。³

2. 2021 年，全球经济从 COVID-19 大流行中双速复苏。在疫苗接种率较低和财政空间减少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落在了后面。此外，发展中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因为复苏引发了商品价格的新一轮上涨和供应瓶颈。对此，许多国家从下半年开始收紧货币政策，抑制国内增长，并增加国内主权债务的成本。这些压力也导致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比预期更早地发出政策利率上调的信号。因此，自 2021 年 9 月以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部金融条件恶化，导致债券利差扩大和货币贬值。⁴

3. 武装冲突放大了这些趋势。首先，2022 年 1 月至 5 月，粮食、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了 30%以上。⁵ 其次，3 月初避险情绪上升引发新兴和前沿市场经济体资本外流，有时外流规模与疫情初始的规模相当。⁶ 虽然 COVID-19 的冲击造成广泛的避险行为，但武装冲突的冲击造成的金融影响不对称。粮食净进口国以及与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有较大贸易联系和商品敞口的经济体面临更多重大挑战，对其债务可持续性动态产生不利影响。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商品净出口商受益于武装冲突的冲击，或至少没有遭受金融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不过，自 4 月底以来这一效果被掩盖了，此前美国联邦储备局宣布更积极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引发广泛抛售新兴和前沿市场经济体的资产和货币。截至 5 月底，新兴市场债券录得近三十年来最严重亏损。⁷

4. 据秘书长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工作组的报告称，拥有 16 亿人口的 94 个发展中经济体受到乌克兰武装冲突引起的三个主要全球传播渠道中

¹ 见 A/76/214 和 A/75/281。

² 见联合国，“乌克兰战争对粮食、能源和金融系统的全球影响”，简报第 1 号，2022 年 4 月 13 日。

³ 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战争使全球复苏倒退》(华盛顿特区，2022 年 4 月)。

⁴ 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最新一期的《贸易和发展报告：冲突时期的缩减》(2022 年 3 月)。

⁵ 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路透特数据计算得出。

⁶ 见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乌克兰战争冲击波考验金融系统的韧性》(华盛顿特区，2022 年 4 月)。

⁷ 见 *Financial Times*，“Emerging markets hit by worst sell-off in decades”，2022 年 5 月 28 日。

的至少一个严重影响，这三个渠道是食品价格上涨、能源价格上涨和全球金融状况恶化。⁸ 这造成了至少一代人以来从未见过的生活成本危机，而全世界更多的人面临类似饥荒的状况和严重的饥饿紧急情况。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当前的紧缩周期时处于特别脆弱的地位。在武装冲突之前，60%的低收入国家已经面临债务困扰的高风险或债务困扰。⁹ 随着下调美国和中国 2023 年增长估计数，预期任何增长放缓都会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利的溢出效应。¹⁰

5. 这一多层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可持续性造成了影响，而国际府对此的反应太少、太迟，加剧了这一令人不安的局面。¹¹ 应采取果断行动，以防止出现普遍的债务危机和另一个失去的发展十年。这就需要采取预防和解决债务的举措。本报告在介绍了 2021 年发展中国家外债可持续性的主要趋势后，讨论了可能采取的举措。最后一节是结论。

二. 外债可持续性的主要趋势

6. COVID-19 大流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独特挑战。危机前夕，许多国家的外债可持续性已经承受压力，但在 2020 年恶化，因为危机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增加了政府融资需求，同时削弱了各国偿还日益增加的债务负担的能力。¹²

7. 2021 年，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存量达到创记录的 11.9 万亿美元，与 2020 年相比增加了 7.6%。本报告将侧重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¹³ 这些国家的债务存量 2021 年达到 9.7 万亿美元，与 2020 年相比增加了 8.1%，¹⁴ 高于 2020 年的 5.2%。这一增长主要是由于 2021 年短期债务上升 16%(见图一)，这本身反映了 2021 年全球贸易增长 10%之后，对全球贸易融资的需要增加。¹⁵

⁸ 见联合国，“乌克兰战争对粮食、能源和金融系统的全球影响”。

⁹ 见基金组织，“List of LIC DSAs for PRGT-eligible countries”，2022 年 5 月 31 日。可查阅 <https://rb.gy/mjnyxa>。

¹⁰ 例如，见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报告》(2022 年 3 月)(见脚注 4)。

¹¹ 见 A/75/281。

¹² 见 A/76/214 和 A/75/281。

¹³ 从 2022 年开始，本报告使用世界银行收入分类法，而不是贸发会议分类法，包括世界银行分类涵盖的所有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这种方法的改变确保了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家层面债务数据报告的可比性和互操作性。因此，分析的国家样本从 2021 年 139 个降至 2022 年 129 个。因此，与前几年相比，名义价值与合计比率都发生变化，主要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原因有二：首先，由于被归类为高收入国家而被排除在世界银行外债报告系统之外的国家也被排除在本分析之外。这涉及根据贸发会议的分类被列为高收入发展中国家中的极少数小国。相反，在以往报告中被称为“转型期经济体”而最近根据联合国或贸发会议的分类被列为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国家仍包括在内，因为它们大多由世界银行分类。

¹⁴ 除非另有说明，增长率指与前一年相比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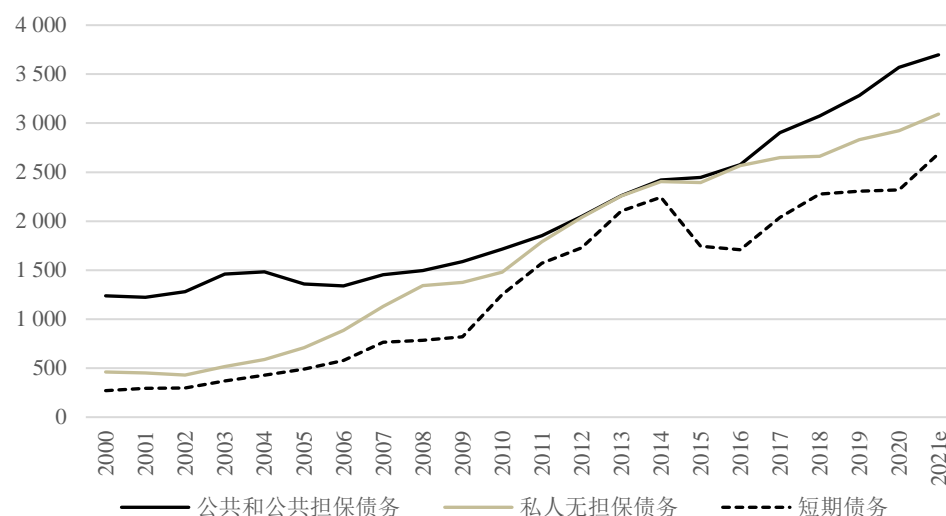
¹⁵ 见《欧洲货币》，“Trade finance bounces back, but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remains a challenge”，2022 年 4 月 1 日。

8. 2020年至2021年，长期债务增长率从6.2%降至4.9%。主要驱动因素是长期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增长率下降。2020年至2021年，这一比率从8.7%降至3.6%。长期私人无担保债务的趋势相反。2021年增加6.5%，是2020年增长率的2倍。从疫情中复苏的经济支撑了这一趋势。一方面，推高了政府收入，缓解了财政制约，以满足融资需求。撤消政策支持使情况更加复杂，尽管主要是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在疫苗接种方面的进展缓解了COVID-19的不利影响。¹⁶另一方面，私营部门的外债随着私人需求的恢复而激增。在供应方面，外国投资者对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主权债券的需求在2021年年中之前一直保持旺盛。¹⁷

图一

2000-2021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外债总额构成趋势

(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出。

缩略语，e=估计数。

9. 因此，短期债务在外债总额中所占比例从25.7%升至27.5%。相反，长期债务占比则从71.8%降至69.6%，为2014年以来最低水平。尽管私人非担保债务增长率高于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但2021年长期债务构成比2020年稳定，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占债务总额的54.3%，私人非担保债务占45.7%。

10. 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外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从2020年的29.2%降至2021年的27.3%，这是由于2021年经济复苏步伐加快(2020年收缩1.7%后增长率为6.8%)。如果不包括中国，2021年这一数字升至38.4%，因

¹⁶ 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疫情期间的复苏——健康问题、供应中断和价格压力》(2021年10月，华盛顿特区)。

¹⁷ 见国际清算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季刊：国际银行业务和金融市场发展”(2021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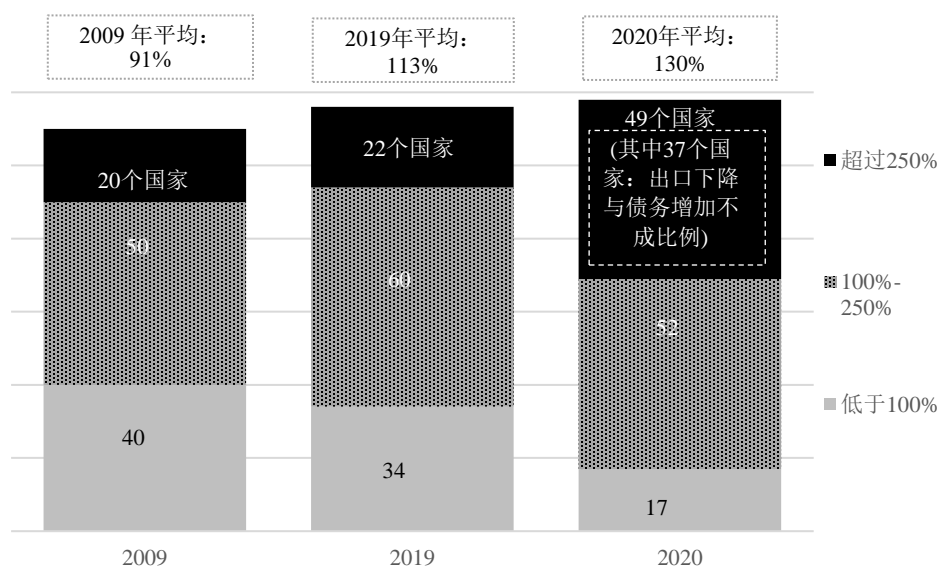
为中国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远高于在外债存量总额的占比(分别为 47.6% 和 26%)。

11. 低、中收入国家的对外偿付能力——中长期内偿还外债的能力——取决于其出口收入(货物和服务, 包括旅游业)。对这些国家而言, 2020 年至 2021 年, 外债总额与出口之比从 130.4% 降至 108.3%。这是由于 2021 年出口(30%)相对于外债存量(8.9%)的较大增幅。出口表现反映了从疫情中恢复引发的两个事态发展: 商品价格飙升和出口量增加。¹⁸

12. 然而, 2021 年外债总额与出口之比下降掩盖了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按这一比率分析各国分布情况显示, 超过 250% 的国家 2020 年有 49 个, 2019 年有 22 个, 因为出口下降与外债总额增加不成比例。¹⁹ 同时, 2020 年仅 17 个国家的比率低于 100%, 低于 2019 年的 34 个国家(见图二)。然而, 各国家组这一情况的恶化程度不均衡(见第二.A 节)。

图二

按选定年份外债与出口比率分列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得出。

13. 随着出口增加, 偿债保持稳定, 还本付息总额与出口之比(另一个对外偿付能力的主要指标)从 2020 年的 17.3% 降至 2021 年的 13.2%。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还本付息额与政府收入之比(公共部门对外偿付能力指标)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从 2020 年的 5.2% 降至 2021 年的 4.5%。这是由于在经济复苏过程中, 2021 年政府收入增长 21.5%, 即使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还本付息额增长了 6.5%。

¹⁸ 见贸发会议, 《2021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从复苏到复原力——发展层面》(联合国, 2021 年)。

¹⁹ 各国 2021 年比率尚未公布。

14. 这些指标的改善主要反映出经济从 COVID-19 危机中复苏，这对出口和政府收入产生了有利影响。国际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外部流动性的广义指标——则呈现相反趋势，从 2020 年的 307% 降至 2021 年的 275%。低、中收入国家流动性缓冲恶化，原因是上文强调的短期债务快速增长。虽然这一水平与疫情前的数字相似，但远低于 2009 年峰值，接近 500%，凸显了这些国家对资本流动突然逆转的高度脆弱性。

A. 按国家组划分的主要外债趋势

1. 收入组别

15.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占有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外债存量总额的 72.2%，占其长期债务的 67.3%，占其短期债务的 86.2%。按债务国分类，它们占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的 60%，占私人无担保债务的 76.2%。2020 年至 2021 年，这一组别的外债总额与出口之比从 124.4% 降至 104%，远低于其他收入组别的水平。这一改善反映了出口收入增加 30.3% 而外债总额增加 8.2% 的综合效果。这些国家中有许多是商品出口国，2021 年受益于商品价格上涨。此外，全球贸易复苏有助于这一组别的出口业绩，因为制造业出口所占份额高于其他收入组别。

16. 组别总数掩盖了各国之间的重大差异。因此，2019 年至 2020 年，外债总额与出口之比高于 250% 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所占比例从 15.5% 增至 37.8%。²⁰ 同时，比率低于 100% 的国家所占比例从 33.3% 降至 13.3%。这一分析突显了 COVID-19 危机对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债可持续性的不利影响程度。对这些经济体而言，市场准入是一把双刃剑。2020 年中期至 2021 年，尽管总体债务水平有所增加，但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能够以疫情前的贷款成本获得外部融资。²¹ 然而，2022 年全球金融条件收紧，这使它们极易受到资本流动波动的影响。这一风险因商业债权人大量参与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79.5%)而加剧。²² 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违约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借款条件产生连锁反应。

17. 2021 年，这些国家的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占外债总额的 31.4%，占比低于其他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用于偿还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的政府收入比例也低于他收入组别(3.9%)。相比之下，2020 年至 2021 年，国际储备与短期债务的比率略有下降，从 287.3 降至 253.2，表明面临资本流动逆转的流动性缓冲较低。

18. 2021 年，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对外偿付能力主要指标也有所改善。2020 年至 2021 年，这一组别的外债总额与出口之比从 145% 降至 118.3%。然而，这一指数水平仍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一样，2021 年这一有利趋势是出口强劲反弹的结果，接近 30%。对这组国家比率分布的分析表明，2020 年(提供国家一级数据最近的一年)恶化程度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更严重：2020 年，

²⁰ 按外债总额与出口之比划分的每个国家组的国家分布数据指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所得。

²¹ 见贸发会议，“贸易和发展报告更新”(2022 年 3 月)(见脚注 4)。

²² 按债权人分列的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构成数据由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出。

40%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这一比率高于 250%，高于 2019 年的 18%；同期，这一比率低于 100%的国家所占比例从 30%降至 16%。

19. 对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而言，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占 2021 年外债总额的 53%。继而依次是，商业债权人 2020 年占债权人基数的 42.2%；用于偿还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的政府收入占比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与 2020 年相比，2021 年仍稳定在 9.8%，高于 2019 年的 8%，这表明二十国集团暂缓偿债倡议其实只是有助于弥补 2020 年新增债务带来的额外偿债。²³

20. 这些国家的国际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录得小幅下降，但在 2021 年仍高于 400%。虽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流动性缓冲大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许多国家被视为前沿市场经济体，²⁴ 极易受到全球金融条件变化的影响。在最近几次金融压力事件中，这些经济体的债券利差攀升幅度远超过新兴市场经济体。²⁵

21. 低收入国家外债总额与出口之比从 2020 年的 273.3%降至 2021 年的 199.4%，但仍然高于前几组国家。2021 年，出口复苏的速度低于中等收入国家(25%)，反映出这些国家出口业绩的技术含量和活力较低。2019 年和 2020 年这一指标在各国的分布清楚地表明 COVID-19 危机对这一组别的打击：2020 年，其中 60%的国家这一比率超过 250%，而 2019 年为 28.6%，只有 15%的国家的比率低于 100%。

22.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占低收入国家外债总额的 75%。这个比例高于其他收入组别。政府收入中用于偿还这一债务的比例也较高，但 2020 年至 2021 年仍稳定在 10%左右。虽然 2021 年收入增加了 14.5%，但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的还本付息增长更快(18.4%)。因此，对这一组别而言，二十国集团暂停偿债倡议也没有增加财政空间，不足以补偿 2020 年主要来自多边债权人的新债务导致的额外偿债。²⁶

23. 与其他收入组别相比，2020 年至 2021 年，低收入国家的国际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从 258%增至 279.7%，2021 年储备增长(22.4%)快于短期债务(13.3%)。虽然 2021 年 6 500 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促进了这一增长，但只有约 37%(2 430 亿美元)流向 150 个发展中国家。29 个低收入国家收到的 1.4%(92 亿美元)已基本使用完毕。同时，在将高收入国家未使用或未充分使用的特别提款权转给最需要的国家方面进展缓慢：对这种转用的承诺仍未达到二十国集团 1 000 亿美元目标，2022 年 7 月首次根据二十国集团的这项倡议实际转让特别提款权。

24. 总体而言，外债可持续性指标表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偿付能力挑战居多。许多国家需要全面债务减免，以便在短期和中期内实现外债可持

²³ 2021 年，参与该倡议的 21 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暂缓偿债倡议潜在节余为 134 亿美元。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得出。

²⁴ 前沿市场经济指在国际债务市场上发行债券的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见基金组织，“低收入经济体公共债务脆弱性的演变，”政策文件，2020 年 2 月。

²⁵ 见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22 年 4 月)。

²⁶ 见世界银行，《2022 年国际债务统计》(2021 年，华盛顿特区)。

续性(见第四节)。以结构转型和改善出口业绩为基础并符合减少对外部和商品依赖的永久性解决方案需要更长的时间框架。迄今为止,只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灾难遏制和救济信托基金为 20 个低收入国家和 11 个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取消了少量债务(9.64 亿美元)。²⁷

2. 联合国各国家组: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25. 最不发达国家的对外偿付能力在经历了 2020 年大幅恶化之后, 2021 年有所改善。²⁸ 2020 年至 2021 年, 外债总额与出口之比从 207.7%降至 188%。与其他收入组别一样, 这一改善源于出口增长(20.3%)大于外债存量增长(8.4%)。出口增长率低于中等收入国家, 反映了这一组别在生产方面的脆弱性, 这种脆弱性决定了出口篮子。²⁹ 2020 年按这一指标划分的国家分布显示出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³⁰ 2020 年, 半数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率超过 250%, 而 2019 年为 20%。同时, 2020 年这一比率低于 100%的国家所占比例下降了一半以上, 降至 15%。

26. 最不发达国家的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占 2021 年总额的 72.8%。2020 年至 2021 年, 政府收入中用于偿还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的比例从 13.2%升至 15%。2021 年, 政府收入增长 13%, 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增长率, 因为在 COVID-19 疫苗接种率低的情况下, 最不发达国家的恢复速度较慢。³¹ 同时,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还本付息额增加了 27%, 这种急剧上升可能是由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借款费用较高。³² 此外, 2021 年这一组别的流动性缓冲保持在 352.5%的舒适水平, 高于低收入国家的记录。

27. 这些指标表明, 最不发达国家面临日益严重的对外偿付能力问题。这些问题既反映了疫情对其经济的特别严重的影响, 包括将稀缺资金转用于卫生和其他应对危机措施, 也反映了长期存在的结构脆弱性。出于同样原因, 这组国家的前景甚至更加令人沮丧, 因为它们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趋势。³³

²⁷ 见基金组织, “灾难遏制和减灾信托——在 COVID-19 大流行背景下的第五笔债务减免”, 政策文件, 2021 年 12 月 20 日。可查阅 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21/12/17/Catastrophe-Containment-and-Relief-Trust-Fifth-Tranche-of-Debt-Service-Relief-in-The-511094。

²⁸ 与纯粹基于收入的分类不同, 对 46 个最不发达国家组的分类采用了额外标准, 如经济脆弱程度、结构障碍和人类发展水平。鉴于数据的可用性, 我们的样本包含 43 个最不发达国家, 其中 19 个是中低收入国家, 24 个是低收入国家。

²⁹ 见贸发会议, 《2021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 新冠疫情之后的世界中的最不发达国家——从 50 年的经验中吸取教益》(联合国, 2021 年)。

³⁰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46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 有 21 个国家处于债务困境或面临债务困境的高风险。

³¹ 2021 年最不发达国家增长率估计为 3%。截至 2022 年年中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联合国, 2022 年, 纽约)。

³² 见贸发会议, 《贸易和发展报告》(2022 年 3 月)(见脚注 4)。

³³ 见贸发会议, 《2021 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见脚注 29)。

28.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由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多层面的脆弱性，这些国家长期以来面临的外部冲击更加严重(见第三.B 节)。³⁴ 2020 年，这一组别的外债总额与出口之比达到 320%，创 2000 年以来新高。虽然 2021 年这一比率降至 267.4%，但仍然远高于其他国家组。按这一比率划分的国家分布情况显示出与最不发达国家类似的趋势，2020 年一半以上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一比率超过 250%，高于 2019 年的 20%。同时，2020 年这一比率低于 100% 的国家所占比例下降了 3 倍多，降至 7.7%。

29. 2021 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在外债总额中所占比例为 38.4%，低于最不发达国家。然而，在所有国家组中，政府收入中用于偿还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的比例最大，表明其财政空间受到的挤压相对较大。2021 年，这一比例略有下降(从 2020 年的 18.5% 降至 16.2%)，原因是与 2021 年旅游业逐步恢复相关的收入增加。其次，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还本付息额小幅下降(3.2%)，这可能与官方债权人在该债务中所占比例上升有关(从 2019 年的 59% 升至 2020 年的 63%)。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还本付息与政府收入的比率较高是这一组别的结构性问题，与税基小和气候脆弱性相关债务成本较高有关(见第三.B 节)。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也更容易受到金融冲击的影响，因为与所有国家组相比，其流动性缓冲较低。2021 年，国际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为 198%，与 2020 年几乎持平。

三. 预防危机的途径：透明度和计量问题

A. 债务透明度

30. 过去十年中，债务透明度在改善国际主权债务结构的多边努力中占据突出地位。这一领域工作的相关里程碑包括贸发会议促进负责任的主权借贷行为原则(2012 年)、《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2015 年)、大会题为“主权债务重组进程基本原则”的第 69/319 号决议(2015 年)、二十国集团可持续融资业务准则(2017 年)和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解决债务脆弱性的多管齐下办法(2018 年)。³⁵ 债务透明度优先化有助于逐步改善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贸发会议等多边机构的工作流程。³⁶

³⁴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分析分类——根据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基于关于规模、脆弱性、确定为岛屿以及确定为主权国家的更严格标准。我们的样本包括 19 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9 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7 个中低收入国家，3 个高收入国家。

³⁵ 见贸发会议，《促进负责任的主权借贷行为原则》；联合国，《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2015 年)；二十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可持续融资业务指南》(可查阅 http://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Content/CH/Standardartikel/Topics/world/G7-G20/G20-Documents/g20-operational-guidelines-for-sustainable-financing.pdf?__blob=publicationFile&v=1；基金组织-世行集团，《二十国集团关于加强公共债务透明度的说明》(2018 年)。

³⁶ 见基金组织-世行集团，《让债务促进发展和宏观经济稳定》；贸发会议，“加强债务数据透明度：贸发会议债务管理和金融分析系统方案 2020-2023 年战略计划”。

31. 由于这些努力，债务透明度指标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³⁷ 然而，仍然存在重大差距，³⁸ 其中包括若干问题，涉及债务覆盖面有限、信息的及时提供以及直接和间接报告来源之间数据的核对和互操作性，主要是因为它们适用于借款人。³⁹ 目前，大多数有资格获得国际发展援助的国家要么没有一个或多个债务报告领域的资料，要么相关资料有限。⁴⁰ 大约四分之一的低收入国家在过去两年中没有报告其债务善，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主权担保的信息，这反映出挑战的严重性。⁴¹

32. 在债务透明度方面缺乏决定性突破是国内和全球层面的一个严重挑战。虽然国家一级仍然存在的透明度挑战损害了降低债务困扰风险和解决成本的有效债务管理做法，⁴² 但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冲击已将许多发展中国家推向债务困境的边缘。⁴³

33. 在此背景下，应立即具体提高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债务透明度，因此需要修订现行办法。债务透明度是一种公共产品，贷款人和借款人都能从中受益。⁴⁴ 因此，采取若干举措，把这一重担放在日益复杂的贷款人群体自愿披露或借款人在国家一级独立改进上，必然会产生迄今为止所看到的零散结果。⁴⁵ 反之，必须采取一种承认共同责任和利益的办法，这是全球公益物的特点。这可具体体现为建立可公开查阅的发展中国家债务数据登记册。按照贸发会议《负责任的主权借贷原则》，该登记册将允许贷方和借方在具体交易层面上整合债务数据，确保直接和间接报告来源的数据具有互操作性。建立登记册的提议得到了参与“COVID-19 时代及其后联合国发展筹资倡议”的专家和机构以及民间社会组织的支持。⁴⁶ 最近，世

³⁷ 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让债务促进发展和宏观经济稳定》。

³⁸ 见大会关于外债可持续性和发展的第 76/193 号决议。

³⁹ 见 Diego Rivetti, “Debt transparency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报告, 世界银行, 2021 年 11 月 10 日。

⁴⁰ 见世界银行, “债务透明度: 债务报告热图” <https://bit.ly/3O1W8ev>。

⁴¹ 见 A/74/234; 联合国, 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 《2022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2022 年, 纽约)。

⁴² 见 Gerry Teeling, “Debt data transparency”, 发展筹资问题政府间专家组第二届会议的背景文件, 日内瓦, 2018 年 11 月 7 日至 9 日。

⁴³ 见联合国, 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 《2022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⁴⁴ 见贸发会议, “布里奇敦协定: 从不平等和脆弱性到人人共享繁荣”(TD/541/Add.2); Anna Gelpern, “About government debt ... who knows?”, *Capital Markets Law Journal*, vol. 13, No. 3, 2018, pp. 321-355。

⁴⁵ 例如, 二十国集团最近建立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债务透明度倡议, 该倡议完全依靠债权人和债务数据商业提供者的自愿披露。迄今, 只有两家银行同意参加该倡议。欧洲债务与发展网络给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和欧洲联盟委员会关于债务透明度倡议的公开信(可查阅 https://www.euroadad.org/letter_on_oecd_s_debt_transparency_initiative_dti); Debt Justice, “Flags hip lending transparency scheme gets information from just two banks”, <https://bit.ly/3ttcHlr>。

⁴⁶ 见联合国, “COVID-19 时代及其后发展筹资。供财政部长审议的备选方案清单”, 第二部分(2020 年, 纽约); 欧洲债务和发展网络, “Transparency of loans to governments”, 2019 年 4 月 2 日。

界银行探讨了此类报告机制的优势。⁴⁷ 应进一步努力，确定在联合国指导下建立此类数据存放处的条件和时间表。

B. 多层面脆弱性指数

34. COVID-19 危机暴露了发展中国家脆弱性的多层性质。气候变化正在强化发展的结构、贸易和融资障碍。这突出表明，应超越收入门槛，评估以减让性条件获得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在内的发展资金的资格。⁴⁸

35. 在发展中国家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因其地理位置偏远、面积小、外部经济依赖性和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等特点，尤其受到多层面的冲击。⁴⁹ 由于不到三分之一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资格获得优惠贷款额度，⁵⁰ 这些国家大多数依赖私人资本流动满足其融资需求，这使其经济特别容易受到这些资本流动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的影响增加了借贷成本，使情况更加复杂。⁵¹

36. 大会认识到这些挑战，呼吁制订多层面脆弱性指数。⁵² 该指数被认为对解决短期债务脆弱性和确保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长期债务可持续性非常必要，这也是对 1994 年以来这一组别呼吁根据脆弱性制定标准的回应。为在 2022 年 12 月前最终确定该指数，成立了具有代表性的高级别专家小组。⁵³ 此举旨在掌握脆弱性的所有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以及国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37. 虽然多层面脆弱性指数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要求的，但也因此努力确保其他国家组之间的可比性，⁵⁴ 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考虑脆弱性的具体组合和不同程度的应对外部冲击能力。

38. 多层面脆弱性指数可通过确保有需要的国家获得资金，在预防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先，该指数可用于提供优惠融资的核心标准，包括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开发银行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和赠款。目前，只有少数机构将气候相关脆弱性作为贷款分配标准。⁵⁵ 因此，将该指数用作分配发展资金的标准可改善有需要的国家获得这一资金来源的机会。第二，该指数可用于确定气候变化相关冲击的影响，并在长期债务可持续性评估中，评估适应和减缓气候

⁴⁷ 见 Rivetti, “Debt transparency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⁴⁸ 见 TD/541/Add.2。

⁴⁹ 见大会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和《关于进一步执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行动纲领的毛里求斯战略》的后续和执行情况的第 75/215 号决议。

⁵⁰ 例如，在 38 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中，有 11 个国家有资格获得世界银行的国际发展援助。

⁵¹ 见 Bob Buhr, Ulrich Volz, “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⁵²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发展筹资后续行动论坛的报告(2021 年)(E/FFDF/2021/3)，第 38 段。

⁵³ 大会关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的后续行动和实施的第 76/203 号决议。

⁵⁴ 见联合国，“可能制订多层面脆弱性指数的可能发展和使用：分析和建议”(2021 年 12 月)。

⁵⁵ 见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2022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变化的融资需求。⁵⁶ 第三,可将该指数纳入状态依存型条款和其他工具的设计中,如巨灾债券。最后,在重新分配特别提款权和提供通过国际基金组织复原力和稳定信托基金发放的资金时,该指数的使用将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⁵⁷

四. 解决债务脆弱性问题

39. 全球冲击继续揭示了现有主权债务架构在根据国家一级债务可持续性评估解决债务脆弱性方面的局限性。现有架构的基本前提是,不可持续的债务是在国家一级运作的独立特质因素的结果。⁵⁸ 然而,过去四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债务积累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国际收支制约因素和汇率波动对外债估值的影响有关。⁵⁹ 最近,巨大的外生冲击正走向债务积累动态的前沿,包括 COVID-19 大流行和气候事件。就前者而言,2019 年至 2021 年,发展中国家政府债务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8% 升至 65%。⁶⁰ 至少 108 个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持续的粮食和能源冲击,政府债务水平高于 2019 年观察到的水平。就后者而言,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被认为是导致债务水平大幅上升的原因。⁶¹ 这一影响被放大,因为许多易受气候影响的国家,包括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见第三.B 节)无法获得优惠融资,以应对气候事件发生后的损失和损害。⁶²

40. 通过债务生成机制将应对这些外生冲击的负担转嫁给国家当局,至少在三个方面会产生反作用。首先,发展中国家被迫同步进行财政整顿,试图稳定债务水平。这对全球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最终破坏债务可持续性。⁶³ 尽管 COVID-19 的影响挥之不去,粮食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但预计至少 106 个发展中国家将在 2022 年通过增税或削减开支改善其财政平衡。⁶⁴ 第二,不断增加的还本付息额限制了政府履行发展目标和人权义务的能力。⁶⁵ 这意味着政府有效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和调动足够资源实现《2030 年议程》和《巴黎气候协定》目标的能力下降。例如,据估计,在 2020 年 COVID-19 大流行的背景下,59 个发展中国家为支付

⁵⁶ 见秘书长关于《2011-2020 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报告(A/73/80)。

⁵⁷ 复原力和稳定性信托基金的资格标准基于收入和人口。见基金组织,“建立复原力和可持续性信托基金的建议”,基金组织政策文件,2022 年 4 月。

⁵⁸ 见 A/74/234。

⁵⁹ 见 Marialuz Moreno Badia、Juliana Gamboa-Arbelaez 和 Yuan Xiang,“Debt dynamics in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is R-G a red herring?”,基金组织工作文章,2021 年 9 月。

⁶⁰ 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计算得出。

⁶¹ 见基金组织,“在易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发展中国家建设抗灾能力”,政策文件,政策文件,2019 年 6 月。

⁶² 见 Preeya Mohan 和 Eric Strobl,“The impact of tropical storms on the accumul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debt”,2020 年 8 月 25 日。

⁶³ 见贸发会议,《2021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见脚注 18)。

⁶⁴ 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22 年 4 月)计算得出(见脚注 3)。

⁶⁵ 见人权理事会,秘书长关于国家外债和其他有关国际金融义务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尤其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影响的说明(A/71/305)。

公共外债分配的资源超过了用于公共保健的资源。⁶⁶ 第三，如果没有既定的解决债务机制，陷入财务困境的国家就会有动力推迟债务重组。⁶⁷ 这增加了债务困扰的成本，减少了投资和长期增长，加剧了贫困和不平等。⁶⁸

41. 首先，国际债务架构的结构改革必须是国际金融体系更广泛改革的一部分。这尤其应解决全球金融安全网的不平等问题。⁶⁹ 目前，与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安全网小得多而且不够多样化。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接入安全网，这意味着流动性危机很可能转变成偿付能力危机。⁷⁰ 与 2000 年代初相比，这种情况因流动性缓冲更低而更加严重。国际社会认可将资本管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永久性政策工具，这将进一步推动在资本流入激增期间遏制外部金融脆弱性的积累，在萧条阶段到来时将流动性危机的风险降至最低。

42. 关于国际债务架构的结构改革，处理债务脆弱性的传统办法导致对债务挑战的积累采取了既不充分又不适当的多边对策，二十国集团暂缓偿债倡议和暂缓偿债倡议后续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就是例证。⁷¹ 该倡议和随后的共同框架都有两个主要缺陷：有资格的国家有限(只有 73 个国家有资格获得国际发展援助和最不发达国家)；缺乏有效机制确保债权人的全面参与，包括多边和私人参与。

43. 二十国集团暂缓偿债倡议允许 48 个国家从 2020 年至 2021 年推迟 129 亿美元的偿债。⁷² 为结合背景理解这一数字，有资格参加暂缓偿债倡议的国家估计在同一时期总共支付 1 033 亿美元的公共外债还本付息额。⁷³ 此外，该倡议的偿还时间表实际上是顺周期的，早期加入该倡议的国家必须从 2022 年 6 月起偿还暂停的债务。因此，在全球利率上升之际，该倡议通过提高偿债额，在某些情况下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1%，正在增加脆弱国家受债务困扰的风险。⁷⁴ 随着该倡议 2021 年底到期，该共同框架已成为债务减免的主要国际机制，但迄今为止也未达到完成目标的预期。建立共同框架的目的是便利处理困境中国家的债务，包括鼓励私营部门更多的参与。该倡议优先考虑通过延长期限和降低利率减免债务。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考虑彻底削减债务总量。迄今为止，只有三个国家(乍得、埃

⁶⁶ 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作出的估计。

⁶⁷ 见贸发会议，“从大封锁到大崩溃：Covid-19 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债务”（2020 年 4 月）。

⁶⁸ 见 M. Ayhan Kose 等人，“The Aftermath of Debt Surges”，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9771 (World Bank Group, Prospects Group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Vice Presidency Office of the Chief Economist, September 2021)。

⁶⁹ 全球金融安全网是全球金融来源(基金组织贷款、中央银行互换和区域金融安排)的网络，防止或支持暂时的国际收支困境。

⁷⁰ 见 Laurissa Mühlich 等人，“No one left behind? COVID-19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afety Net for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贸发会议，2022 年 4 月）。

⁷¹ 见 A/76/214 和 A/75/281。

⁷² 见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2022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⁷³ 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2022 年国际债务统计》计算得出(见脚注 26)。

⁷⁴ 见 Scope Ratings，“Africa’s solvency crisis: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20 debt relief a sign of multilateralism, but a ‘DSSI+’ framework is required”，16 November 2020。

塞俄比亚和赞比亚)通过共同框架申请了债务处理,在2022年6月底之前或在最初申请一年多之后,没有一个国家成功重组债务。⁷⁵展望未来,共同框架取得成功的前景仍不确定。⁷⁶这反映了围绕双边债权人协议构建的过时程序的巨大局限性,该程序将商业和多边债权人以及主权债务人排除在外,⁷⁷不适合解决当前债务状况的复杂性。

44. 在此背景下,必须对发展融资和主权债务的全球架构进行结构性调整,才能在解决外债脆弱性问题的同时实现《2030年议程》。首先,应允许发展中国家利用而不是借入其发展方式。这包括修订全球贸易和税收制度,以促进结构转型和支持国内资源调动。⁷⁸特别重要的是,按照国际金融问责、透明和廉正问题高级别小组的建议,制定一项普遍参与的联合国税收公约。⁷⁹第二,应根据既定承诺,包括与气候融资有关的承诺,扩大提供官方发展援助的规模。第三,应更新国际金融机构的融资和贷款结构,⁸⁰包括建立特别提款权发展联系,修订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条款和条件,并提高其杠杆率。⁸¹第四,应建立关于债务重组的多边法律框架,允许暂停偿债、中止诉讼、外汇和资本管制以及拖欠贷款,以便在所有官方(双边和多边)和私人债权人的参与下,促进及时有序地解决债务危机。⁸²应通过提供与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挂钩的债务减免鼓励参加该框架,该评估纳入了长期资金需求,包括实现《2030年议程》和《巴黎气候协定》的资金需求。⁸³

⁷⁵ 见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2022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⁷⁶ 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对国债拖欠政策及其范围的审查》,政策文件,2022年5月18日。

⁷⁷ 见世界银行,“解决疫后高额债务问题:过去债务减免的经验教训”(2022年1月);Indermit Gill, “It’s time to end the slow-motion tragedy in debt restructurings”,世界银行博客,2022年3月1日。

⁷⁸ 见贸发会议,《2018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权力、平台与自由贸易之谬》(纽约和日内瓦,联合国,2018年)。

⁷⁹ 见联合国,《金融诚信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金融问责、透明和廉洁以利实现2030年议程高级别小组的报告》(2021年2月)。

⁸⁰ 见 A/76/214; A/75/281; 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2022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⁸¹ 见贸发会议,《2021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从复苏到复原——发展层面》;Daouda Sembene, Nancy Lee and Mark Plant, Country Platforms and Delivery of Global Public Goods,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paper 249, January 2022; and Riccardo Settimo, “Higher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 lending, unchanged capital resources and triple-a rating. A possible trinity after all?”, *Questioni di Economia e Finanza*, occasional papers, No. 488, April 2019.

⁸² 见贸发会议,《2015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使国际金融架构为发展服务》(纽约和日内瓦,联合国,2015年)。

⁸³ 见 A/76/214; 贸发会议,《201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资助全球绿色新政》(日内瓦,联合国,2019年)。

五. 结论和建议

45. 除了疫情，乌克兰武装冲突和气候事件加剧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的压力。截至编写本报告时，发达国家持续货币紧缩使这些国家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

46. 根据大会第 76/193 号决议和《布里奇敦协定》⁸⁴ 的建议，迫切需要采取预防和解决债务的举措，避免失去另一个发展十年。关于预防债务危机，除了进行更广泛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包括全球金融安全网，应加强现有的债务透明度举措，为此建立一个可供贷方和借方公开查阅的债务数据登记册。这将确认债务透明度的共同责任和好处。报告还讨论了编制多层次脆弱性指数如何能够有助于预防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

47. 关于解决债务危机，报告重申迫切需要进一步推动就建立一个符合长期发展融资需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权债务重组进程和债务减免措施多边框架进行讨论。

⁸⁴ 见 [TD/541/Add.2](#)。

附件

按国家组分列的中、低收入国家外债

(十亿美元)

	2009-2021 平均	2018	2019	2020	2021 ^a
所有中低收入组					
外债存量总额 ^b	6 980.3	8 169.6	8 598.3	9 042.6	9 778.3
长期外债	4 916.2	5 735.1	6 114	6 490.1	6 810.2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52.3%	53.6%	53.7%	55.0%	54.3%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47.7%	46.4%	46.3%	45.0%	45.7%
短期外债	1 907.7	2 277.2	2 306.4	2 306.4	2 689.4
外债还本付息总额	872.0	1 115.2	1 235.9	1 199.3	1 187.9
债务比率^c					
外债总额/GDP	25.5%	26.1%	26.7%	29.2%	27.3%
外债总额/出口 ^d	102.3%	106.6%	113.6%	130.4%	108.3%
还本付息总额/GDP	3.2%	3.6%	3.8%	3.9%	3.3%
还本付息总额/出口 ^d	12.8%	14.6%	16.3%	17.3%	13.2%
储备/短期债务	339.0%	280.7%	289.7%	306.6%	274.6%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还本付息额/政府收入	4.0%	4.6%	4.7%	5.2%	4.5%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外债存量总额 ^b	5 113.6	5 945.6	6 201.2	6 476.5	7 054.7
长期外债	3 400.1	3 898.3	4 129.5	4 370.3	4 580.8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46.8%	48.0	48.1	49.4	48.3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53.2%	52.0	51.9	50.6	51.7
短期外债	1 630.4	1 961.7	1 969.6	1 981.6	2 317.0
外债还本付息总额	660.7	865.1	949.8	912.4	889.2
债务比率^c					
外债总额/GDP	25.1%	25.2%	25.8%	28.0%	26.1%
外债总额/出口 ^d	100.4%	103.8%	109.8%	124.3%	104.1%
还本付息总额/GDP	3.2%	3.7%	4.0%	3.9%	3.3%
还本付息总额/出口 ^d	13.0%	15.1%	16.8%	17.5%	13.1%
储备/短期债务	328.3%	269.2%	276.8%	287.3%	253.2%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还本付息额/政府收入	3.3%	3.9%	4.0%	4.1%	3.4%
中低收入					
外债存量总额 ^b	1 745.9	2 082.1	2 246.4	2 399.9	2 549.1
长期外债	1 415.9	1 717.3	1 858.0	1 981.5	2 086.8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62.8%	63.7%	63.7%	64.8%	64.9%

	2009-2021 平均	2018	2019	2020	2021 ^a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37.2%	36.3%	36.3%	35.2%	35.1%
短期外债	265.6	301.3	321.5	323.9	356.1
外债还本付息总额	206.6	245.1	279.6	279.4	289.3
债务比率^c					
外债总额/GDP	26.5%	28.4%	29.1%	32.6%	30.4%
外债总额/出口 ^d	105.2%	111.9%	121.5%	145.5%	118.3%
还本付息总额/GDP	3.1%	3.3%	3.6%	3.8%	3.4%
还本付息总额/出口 ^d	12.5%	13.1%	15.1%	17.0%	13.4%
储备/短期债务	407.0%	355.4%	369.4%	426.7%	413.8%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还本付息额/政府收入	7.0%	7.5%	8.0%	9.8%	9.8%
低收入者					
外债总额股票 ^b	120.7	141.9	150.7	166.3	174.4
长期外债	100.2	119.4	126.4	138.3	142.6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92.0%	89.7%	89.2%	89.5%	91.4%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8.0%	10.3%	10.8%	10.5%	8.6%
短期外债	11.7	14.2	15.3	14.4	16.2
外债还本付息总额	4.8	5.0	6.4	7.5	9.4
债务比率^c					
外债总额/GDP	29.4%	35.1%	35.5%	38.3%	39.4%
外债总额/出口 ^d	182.2%	195.8%	215.0%	237.3%	199.4%
还本付息总额/GDP	1.2%	1.2%	1.5%	1.7%	2.1%
还本付息总额/出口 ^d	7.4%	7.2%	9.6%	11.2%	11.3%
储备/短期债务	289.6%	270.5%	254.7%	258.0%	279.7%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还本付息额/政府收入	6.8%	7.9%	10.0%	10.3%	10.6%
最不发达国家					
外债存量总额 ^b	302.3	374.1	403.1	446.5	483.8
长期外债	256.2	327.2	351.1	381.9	409.2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85.8%	82.9%	82.7%	83.3%	86.0%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14.2%	17.1%	17.3%	16.7%	14.0%
短期外债	30.9	33.3	37.4	41.8	48.8
外债还本付息总额	20.3	26.3	32.8	30.7	36.9
债务比率^c					
外债总额/GDP	32.9%	35.4%	36.6%	40.3%	40.9%
外债总额/出口 ^d	144.7%	159.0%	169.1%	207.7%	188.0%
还本付息总额/GDP	2.2%	2.5%	3.0%	2.8%	3.1%
还本付息总额/出口 ^d	9.9%	11.4%	14.0%	14.6%	14.5%
储备/短期债务	387.2%	398.7%	373.6%	361.8%	352.4%

	2009-2021 平均	2018	2019	2020	2021 ^a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还本付息额/政府收入	10.2%	12.7%	15.1%	13.2%	15.0%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e					
外债存量总额 ^b	46.7	56.1	59.7	62.0	66.1
长期外债	34.7	42.6	45.3	47.0	48.6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53.1%	49.8%	47.3%	49.7%	52.2%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46.9%	50.2%	52.7%	50.3%	47.8%
短期外债	10.1	11.8	12.8	12.5	14.5
外债还本付息总额	6.5	6.8	8.4	6.3	8.1
债务比率^c					
外债总额/GDP	64.5%	69.6%	73.5%	89.0%	90.5%
外债总额/出口 ^d	207.5%	198.7%	210.3%	320.0%	267.4%
还本付息总额/GDP	8.9%	8.4%	10.3%	9.1%	11.0%
还本付息总额/出口 ^d	36.1%	30.2%	37.0%	41.6%	41.1%
储备/短期债务	211.1%	192.2%	182.1%	192.5%	198.1%
公共和公共担保债务还本付息额/政府收入	15.8%	13.4%	21.2%	18.5%	16.2%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家来源计算得出。

注：国家组是按世界银行分类方法定义的经济组别，可查阅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缩写：GDP，国内生产总值

^a 2021 年估计数。

^b 债务存量总额包括长期债务、短期债务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信贷的使用。

^c 已根据国家数据的可用性对用于计算比率的数据进行了调整。

^d 出口额包括货物、服务和原始收入。

^e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组还包括圣基茨和尼维斯、塞舌尔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尽管它们被世界银行列为高收入国家。